

论当代中国的诚信建设

■ 全林远 赵周贤

[摘要] 近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诚信缺失问题日益凸显,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很大危害。本文在阐述现代诚信结构特点基础上,对我国政务、商务和社会领域存在的诚信问题,从社会转型影响、传统文化历史局限、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信仰淡漠导致的动力缺失以及诚信约束体系缺位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坚持强化道德引领与完善利益约束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努力构建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体系,以提高政务诚信水平为引领,以公民个体道德素养培育为基础,把树立共同社会理想与实施分层信仰引导结合起来,发挥政务诚信的社会引领、统摄效应,建立科学统一的社会征信系统,优化调整社会诚信结构等全面推进诚信建设的思路 and 对策。

[关键词] 诚信建设;诚信缺失;深层原因;建设路径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1)06-0024-05

近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诚信缺失问题日益凸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很大危害。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1]按照《决定》要求,加强诚信建设,重塑诚信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一、诚信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诚信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诚信构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运行和发展的重要伦理基础。诚信是为人处事之道、经商治学之本、治国安邦之纲。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必衰。诚实守信,在现代人类的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它是公民个体道德的基石,是维护社会良性运行秩序的保证,是规约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准则,是提升政府治国理政能力的要素。

一个国家的诚信结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务诚信是关键,主要指公共权力行使过程的诚信;商务诚信是要域,主要指商品生产交易领域的诚信;社会诚信是基础,主要指公民个体及其集成整体的诚信素养。此三者既相对独立、区别,又彼此渗透、制约。

政务诚信对其他社会主体诚信发挥重要的表率、导向作用。政务诚信,体现于涉及公共权力层级关系的行政性社会交往,由此形成的信任关系为“垂直信任”;而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体现于非公共权力层级关系的社会个体或群体之间的交往,由此形成的信任关系为“水平信任”。从社会发展环境视角看,今天已进入公共管理时代;整个社会对公共机构、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共精神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由此,“垂直信任”的完善,直接影响“水平信任”的构建。国家机关、政府部门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行为主体,只有各级官员讲诚信,才能取信于民,增强凝聚力、向心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政府遵守承诺,企业才会履行契约,民众就会“不令而行”;政务缺乏公信力,社会诚信体系就难以形

成令人心悦诚服的正确导向,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便举步维艰,民众、法人也难免“虽令不从”。政务伦理的失范,会带坏整个社会风气;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仅造成政务体系运行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规则普遍的扭曲、失灵。

商务诚信是社会诚信水平的重要显性标示。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人们相互之间的日常“水平交往”中,交易性交往占有很高的比重,因而,“水平信任”的形成与商务诚信密切相关。由于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物质利益,商务诚信问题更易于为社会大众和新闻媒体所关注,成为舆论焦点;由于商务诚信与各类社会主体均有较高相关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务诚信和社会诚信的状态;由此,商务诚信以更为显性的方式,成为人们评价整个社会诚信水平的重要依据。从传统诚信向现代诚信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发端和根植于商务领域的经济契约,见证了契约文明由物质层面向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递进的历史过程,推动诚信由传统以修身养性为基础的内敛自律,转变为内敛与外约、自律与他律为依托的人性与理性、道德与法制、信仰与契约有机结合的现代诚信。在现代诚信体系中,商务诚信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转必不可少的前提,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而契约的顺利履行是以诚信为基本依托的。商务诚信,既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规范和道德底线,又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无形资产和高端源泉;是人与人之间商务关系得以维护的基本依据,是经济生活得以展开的基础条件;是给交易主体带来长期利益最可靠的精神资本,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最深刻的伦理资源。

社会诚信是深蕴社会和谐进步、国家繁荣富强的沃土。就公民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是立足法治社会的根基;就由公民个体集成的整体而言,诚信既是良好的国家形象和社会风貌,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的不竭动力。人作为社会存在,其最基本的形式就是人际交往,而诚信是人际交往的基础。诚信的培育和涵养是人类道德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提高自我道德素养、铸造理想的道德人格、培养优秀的道德个性的必由之路;而在这一过程中积累磨练出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更是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深厚的力量蕴藏。诚信是社会

和谐进步的根基,社会成员之间只有以诚相待、取信于人,才会有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才能促进社会在积极互动中发展进步,才能基于新的社会结构实现持久繁荣稳定。从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视角看,树立现代诚信理念的过程,是一个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不断解放、更新的进程,这一进程可以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制度改革和体制完善,提供强劲的精神动力、积极的社会氛围、可靠的路径保障、创新性战略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由于诚信建设相对滞后,社会上也呈现出比较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诚信缺失所引致的伦理失范日益扩散,侵蚀着国家和社会的肌体。2011年2月11日至14日,《瞭望》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五个城市,进行了社会诚信状况调查。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对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好”,47.8%评价“一般”,而认为“差”和“很差”的占46.6%。此前,2009年《小康》杂志联合新浪网对我国“诚信小康”状况进行的抽样调查、《人民论坛》所作的“千人问卷”调查、2010年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调查,都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虽然这些调查数据由于样本有限,并不能精确表明社会诚信的总体状况,但诚信缺失问题日益凸显却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屡屡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表明诚信缺失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实际上,诚信缺失远不止于上述商务领域,政务诚信和社会诚信的缺失也已不容忽视。尤其是政务领域出现的欺上瞒下、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等严重失信现象,其“示范效应”更是不可低估。勿庸讳言,长此以往必然损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好关系,扰乱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破坏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更无以承载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历史重任。正视我国社会诚信观念和诚信道德的严峻形势,深入剖析诚信缺失的深层原因,切实加强诚信建设,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紧迫任务。

二、社会性诚信缺失的深层原因

目前,说明诚信缺失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性公害。

对于任何失信行为,失信者个人都难辞其咎,但是出现如此广泛的社会失信行为,必须探究其深层社会原因。

第一,社会剧烈变动、转型的深刻影响。梁启超先生曾指出: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近代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随着国家的衰落和外敌的入侵,整个中国社会长期陷于战乱频仍、动荡萧索的状态,这造成了中华民族性格和人文伦理的极大扭曲。而20世纪以来的革命、战争、政治运动与社会转型,直接塑造了我国社会诚信状况演化的时代大背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树立新的政治文化观念的进程中,对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思想信仰造成很大冲击;十年动乱的大破坏,发展市场经济导致的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以及近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腐败现象的蔓延,则在进一步消解传统诚信理念的同时,使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形成的风清气正的党风政德与诚信理念遭到严重破坏。而在新历史条件下,以现代公民社会为基础,既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又能适应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诚信理念,还远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当前,整个社会处于不稳定的转型期,增加了建立稳定的社会诚信体系的难度。

第二,传统文化的局限性构成的历史约束。民族文化是诚信形态的重要历史背景。中华民族素有“崇尚诚信”的优良传统,诚信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儒家伦理作为几千年来中国的主流文化,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其诚信理念中的一些重要构成形态,是植根于由封建皇权至上、官僚权力等级和宗族血缘亲疏决定的尊卑贵贱的“垂直关系”之中的。首信于君主,为忠;次信于家父,为孝;再信于夫妻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为义;对陌生人遵循什么规则,却较少涉及,几近空白。这种由“垂直关系”决定的“特殊信任”程度高、“普遍信任”程度低的诚信结构,与现代诚信观所要求的“水平信任”的均等性、一致性相悖,难以适应从传统人际交往范围由有限的“熟人社会”向现代人际交往空间无限的“陌生人社会”过渡的伦理需求。此外,儒家的立信授信观更多依赖于人格自律,忽略外在制约力量保证,强调德性而轻视规则,把道德培育看作是一种人格的单纯自我修炼活动。这与现代诚信观主张自省与他

律、强制性约束与引导性约束有机结合的立信授信结构有较大差距。上述文化历史传统的无形渗透和深层惰性,使我国社会大众诚信理念的现代化更为艰难。

第三,社会建设相对滞后导致的结构失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成分和经济主体日益多样化,由此使社会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性增强,成为当前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人们的居住地、职业、社会地位都在发生着持续、广泛、深刻的变化,在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会流动中,人们社会交往的频率大大增加、范围空前拓展;同时,与同一交往对象的重复互动明显减少,这加剧了交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背信弃义成本大大降低,给违背诚信提供了诱因,由此导致出现大范围社会性失信风险的可能性上升。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加强维护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需求大幅度增长,其中调整和完善社会建设是关键点之一。信任,作为一种相对稳定并嵌入特定社会结构之中的系统,不仅包含公正的本质这样深层次的价值判断,而且还包括实实在在的乡俗民约、职业规范等行为准则,因而蕴含着与这个社会相一致的心理、文化及习俗。它来自于我们的心灵深处,是在一定外部规约的条件下内生增长的结果。从信任的上述特点的视角看,在维护整个社会诚信的体系结构中,与政府单独维信相比,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维信,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公民的自我组织、自我引导、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潜能,以更低的成本、更贴近心灵的方式,更自然、更有效、更及时地履行维信职责。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我们一直突出经济建设而相对忽视社会建设,尤其忽略了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社会信任体系建设,长期依赖以往的社会信任关系和信任结构去处理当前的社会问题,不仅效果不佳,而且迟滞了新型社会信任关系和信任结构的形成;由于社会建设滞后,公民社会、公共空间发育不良,限制了民间社会组织的良性生长,因此只能由政府承担绝大部分的维信职能,不仅政府的维信负担过重、成本过高,而且远不能满足社会转型期的维信需求;由此造成的社会信任关系和维信体系的结构性失衡,使社会转型期出现大范围社会性失信风险由可能变为现实。

第四,信仰淡漠造成的内在动力缺失。道德与信

仰高度相关,而诚信是信仰的重要外在表现之一。任何人都既有对物质利益的渴望,又有超越物质利益的内在精神追求,信仰就是实现自我超越的最深厚的内在动力。对于诚信的确立而言,基于法规的外在利益约束固然重要,但基于信仰的内在道德引导更具有持久而坚韧的张力。今天,信仰和诚信正面临着系列严峻的新考验。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变动大调整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既并存同在,又频繁互动转换;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各种思想理念、文化思潮既深入广泛地相互交汇融合,又短兵相接地彼此激荡碰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既遭遇了重大挫折,又取得了开创性成绩;对于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走向世界的国人而言,确立主流信仰较之过去无疑更为复杂曲折。当两大对抗阶级组成社会结构的主体时,社会理想与个人信念、社会历史观与人生观更易于整合统一;而当今中国,社会结构与利益关系日益多元化,要使远大的社会共同理想深入个人的心灵,必然面对许多前所未有的困惑与阻力。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社会摩擦加剧,各类矛盾交织,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各种消极现象,特别是在经济、政治、社会等一些领域存在的“潜规则”,与价值观的主流导向形成巨大反差,严重消解着高尚信仰的形成。没有信仰,诚信就不会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抽芽;信仰淡漠就会使人们缺失坚守诚信的内在动力。

第五,诚信约束体系缺位引致的失信成本低。建立以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为依托的利益约束体系,是现代社会维信整体结构中的关键性环节——借助利益约束体系影响失信行为的成本和守信行为的收益,使守信者获益、失信者受损,以此引导人们作出诚实守信的行为选择。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建立社会征信——评价——查询系统,是构建利益约束体系的重要操作方式之一。这一系统有利于解决市场交易及其它各类人际交往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长远利益与行为主体的诚信水平联系起来,使公民或法人趋向于将诚信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统一、权威、准确、实时的社会征信——评价——查询系统,由此既难以事前对行为主体作出诚信度预判,又不能事后及时制止失信者的重复失信,缺乏这一系统的支持,相关法规亦无用武之地。由于利益约束体系既严重缺位,又执行不

力,造成守信收益小,失信成本低,以致形成与诚信相悖的行为导向,李鬼打败李逵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加强诚信建设的路径

诚信建设应坚持强化道德引领与完善利益约束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努力构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道德体系;以提高政务诚信水平为引领,以公民个体道德素养的培育为基础,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诚信建设。

第一,将树立共同社会理想与实施分层信仰引导结合起来。如果说在经济成分单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层次的信仰引导是可行的话,那么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实施多层次的信仰引导。应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精神需求特点,分层次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引导,导向应更加具体化,当前特别应着重探索非宗教的适合普通大众的积极向上的信仰取向,使之与普通民众产生发自内心的思想共鸣。同时,以人们自我超越的需求、精神升华的需要为内在牵引,以各社会群体不同层次的信仰生长点为依托,逐步奠定适宜确立共同社会理想的信仰基石。让全体公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归依,以各自积极平实的信仰为激励和约束,达成诚实守信、自律向善的伦理境界。在信仰引导中,应既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藏,又注意借鉴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经过再锻造,将现代契约意识、诚信精神与传统诚信道德结合起来,以培养公民独立健全人格为基础,熔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内在品质。

第二,发挥政务诚信的社会引领、统摄效应。政务诚信是确立和维护现代社会诚信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诚信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和价值更为凸显。当前,应以增进民主、响应民意、保障公益和维护公正为着力点,全面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使之真正成为社会其它领域诚信建设的先导和表率。首先,增进民主是政务诚信建设的根本依据。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理顺党政关系,优化权力结构,完善监督体系;以党内民主引领和完善人民民主,逐步形成对公共

权力激励与约束有效平衡、权位高低与约束力度相称的体制机制;筑牢政务诚信建设的政治基础,以“权为民所赋”的制度构架,为公共权力的诚信行使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其次,响应民意是政务诚信建设的人本指向。政务诚信建设,必须以提高响应民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重要目标。公共权力来自人民,体察民情、善解民意、对公众的需求和意见作出积极响应,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是政府部门和各级官员所应秉持的行为取向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以响应民意的态度和效率实现“情为民所系”,是维系政府诚信形象的根本价值要求,是衡量官员诚信素养的基本伦理尺度。再次,保障公益是政务诚信建设的基本任务。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其基本职能就是以人民忠实代表的身份,最大限度地促进和保障公共利益。能否遵循和实现“利为民所谋”,既是政府治国理政水平最有说服力的标志,更是老百姓判断政务诚信的重要依据。最后,维护公正是政务诚信建设的制度保障。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政府诚信建设的制度性根基。坚持公平正义是政府保持其公信力的道德底线,也是其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支配力的重要来源——政府不仅以其政策和行为的公共性而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自身的威信,更要克尽职守地履行公共制度和公共规则的提供者和护卫者的责任,赢得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能否真正保证“权为民所用”,是最终能否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

第三,建立科学统一的社会征信系统。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征信——评价——查询系统,可以更好地解决现代社会各类人际交往大幅度增加所引致的信用信息供不应求和交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社会征信机构建设,应当使公共模式与民营模式并举互补,并在条件具备时引入外资征信机构,形成征信业的良性竞争,通过市场引导促进征信业健康有序发展。通过整合目前分属工商、质检、财政、税务、审计、司法和银行等系统的各类信息,建立以互联互通的信用资料数据库为基础的公共信息平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法规,借助社会征信系统的信息支持,依法追究失信者的责任,给予相应的法律惩治,改变守信与失信的机会成本严重扭曲的现状,使守信者获得公允回报,让失信者得不偿失,

依此形成褒奖诚信的刚性行为导向。

第四,优化调整社会维信结构。大力推进社会建设,保障和引导民间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使城乡社区、行业协会等各类社会组织,成为政府社会职责的分担者、合作者和监督者;一方面扩大和深化社会管理系统的有效作用范围,提高管理机制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制约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缺位”与“越权”。逐步改变政府承担过多维信责任的状况,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维信成本低、效率高、效果好的特有优势,适应现代诚信建设的社会环境变迁,有效弥补传统社会中的宗族系统逐步消解留下的社会空间,深入调整过度行政化造成的维信结构失衡。当前加强诚信建设,应大力挖掘和发挥社区、协会等各类社会组织的维信潜能,努力使之成为推动现代诚信建设的新型社会载体。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6.

参考文献:

- [1]王利明.关于诚信的法学思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05).
- [2]张静.诚信及其社会约束机制[N].光明日报,2011-08-23.
- [3]燕继荣.公信力:政府的立身之本[N].人民日报,2011-07-15.
- [4]王韶兴.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N].人民日报,2011-07-15.
- [5]刘智峰.政治腐败是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论道德与政治[N].中国改革网,2011-04-28.
- [6]邓伦胜.改革开放30年来诚信问题研究综述[J].中外企业家,2008(07).
- [7]高和荣.社会危机事件的信任求解[J].江海学刊,2011(03).
- [8]何洪周.社会诚信危机及其调适[J].四川省机关党校学报,2006(02).
- [9]杭仁春.行政契约的结构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9(01).

作者简介:全林远,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赵周贤,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海峰